



新编
中国

上下五千年



新编中国上下五千年

(五)

姜 霞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八编 东晋南北朝

残忍治军的宗越	(1573)
元嘉之治	(1575)
南朝大学者裴松之	(1579)
《后汉书》的作者范曄	(1582)
彭城王专政	(1598)
刘劭政变	(1602)
自相残杀	(1606)
南齐的建立	(1609)
周盘龙	(1613)
名臣羊侃	(1615)
南朝勇将萧摩诃	(1621)
陈庆之转战千里	(1625)
侯景之乱	(1629)
廉洁奉公的孙谦	(1654)
清廉公正的何远	(1656)
刚正廉直的褚玠	(1659)
“萧娘”萧宏	(1660)
陈后主张贵妃传	(1665)
沈约传	(1667)

贵族学者萧子显	(1673)
科学家祖冲之	(1676)
中外关系及文化交流	(1679)
南齐的高人逸士	(1683)
梁朝的处士	(1696)
山中宰相陶弘景	(1712)
南朝书家王僧虔	(1714)
学者萧子云	(1724)
诗人谢朓	(1727)
文学家庾信	(1731)
山水诗人谢灵运	(1745)

第九编 隋唐盛世

杨坚篡周建隋	(1753)
隋代名将韩擒虎	(1757)
隋朝名将贺若弼	(1760)
隋文帝独孤皇后	(1763)
输籍法	(1766)
大索貌阅	(1769)
科举制	(1771)
隋抗突厥	(1772)
统一南北	(1774)
权臣杨素	(1776)
东都洛阳城的营建	(1788)
三下江都	(1790)
三征高丽	(1794)
隋末农民大起义	(1797)

地理学家裴矩	(1798)
建筑学家宇文恺	(1805)
建筑学家何稠	(1807)
天文学家刘焯	(1810)
儒学家刘炫	(1812)
术士庾季才	(1818)
天文学家张胄玄	(1822)
隋炀帝之死	(1827)
枭雄李密	(1829)
横行江南的杜伏威	(1839)
穷途末路的宇文文化及	(1841)
隋炀帝萧皇后	(1846)
李渊晋阳起兵	(1849)
唐太宗李世民	(1852)
夏王窦建德	(1870)
唐前期的法律	(1879)
玄武门之变	(1883)
贞观之治	(1885)
贞观宰相房玄龄	(1890)
犯颜直谏的魏征	(1898)
科举制度的完备	(1918)
均田制与租调制	(1920)
名将李勣	(1924)
猛将秦叔宝	(1931)
军事家李靖	(1933)
官修五代史	(1935)
史学家李延寿	(1938)
史学家李百药	(1941)

初唐名学者颜师古	(1951)
博涉文史的令狐德棻	(1953)
直言不隐的姚思廉	(1957)
史学家吴兢	(1959)
天可汗	(1960)
玄奘西行	(1962)
北宗神秀	(1964)
“将军三箭定天山”	(1967)
遣唐使	(1971)
侯君集平高昌	(1975)
道士司马承祯	(1977)
河西四镇的兴废	(1979)
从《氏族志》到《姓氏录》	(1982)
文成公主和亲	(1984)
初唐的诗歌	(1987)

残忍治军的宗越

宗越，南阳叶县（今在河南）人。晋朝发生动乱的时候，迁居南阳宛县，后来统一整理户籍，又归属于叶县。宗越的家族本来是南阳的次等门第，安北将军赵伦之镇之雋阳，襄阳人中间不够列入门第氏族的杂姓很多，赵伦之委派他的长史范凯之整理排列氏族，辨别高低，范凯之把宗越贬黜成为服役的低等门户。宗越就开始出仕为郡中的小吏。

宗越的父亲被鸢人所杀死，杀死他父亲的人曾经来到郡城，宗越在集市上刺死了他。太守夏侯穆赞赏他有孝心又勇敢，提升他做了队主。蛮人发生劫掠行为，常常派宗越前去征讨，每次出兵就建立功劳。由于家里贫穷没有钱买马，宗越经常手持刀和盾牌步行而出，单身作战，许多敌兵都没有人能阻挡他。每次战胜，郡中的将领就赏赐五百钱，宗越就凭这些赏钱能购买了马匹。后来被征召，到州里当了队主。宋孝武帝刘骏没有即位以前镇守襄阳，任命宗越为扬武将军，率领都督府的禁卫部队。元嘉二十四年，宗越启奏宋文帝要求恢复次等门第，把户籍迁移属于冠军县，得到批准。元嘉二十七年，跟随柳元景北伐，率领骑兵，隶属于柳元景部下，立下战功，这段事情记载在《柳元景传》中。回军南下以后出任后军参写督护，随王刘诞当时任后将军、雍州刺史，跟宗越开玩笑说：“你说什么人，竟得到了我府里的四个字官衔。”宗越回答说：“佛狸（托跋焘）只要不死，我不愁不能得到谥议参军。”刘诞听了大笑。

宗越随同柳元景征伐西阳蛮人。因为碰上宋孝武帝起兵讨伐杀死父亲宋文帝的太子刘劭，宗越转为南中郎长兼行考军，在新亭之战口立下战功。孝武帝即位，任命宗越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大

司马行参军、济阳太守，不久又加封龙骧将军。臧质、鲁爽起兵反叛朝廷，宗越领兵占据历阳。鲁爽派遣将军郑德玄前进占据了大岷，郑德玄派遣部分兵力，由杨胡兴、刘蜀率领骑兵、步兵三千人，进攻历阳。宗越领骑兵、步兵三千人在历阳城西边十多里处抵御，大破杨胡兴、刘蜀的兵马，斩杀了他们。鲁爽破平定以后，又率领自己的部队开进梁山抵御臧质。臧质败逃，以宗越的战功居多。宗越乘势追赶到江陵。当时荆州刺史朱修事没有到达，宗越大肆杀戮，同时又逼迫劫取南郡王刘义室的子女，因此而获罪，关在政府的作坊里做苦工。不久被赦免，官复原职，又追计从前的功劳，官号照旧不变。

大明三年，转为长水校尉。随王刘诞改封竟陵王，占据广陵（今江苏扬州）造反，宗越率领骑兵在沈庆之的指挥下攻打刘诞。等到广陵城攻陷，孝武帝命令把城内的男性成年人全部杀光，宗越奉旨具体执行，亲自办理，对被杀的人无不先加以毆打，有的还鞭打他们的脸部，高高兴兴地好像得到了什么，被他杀死的总共有几千人。大明四年，改封为始安县子，食邑的户数和以前一样。这一年，以被任命为督司州、豫州的汝南、新蔡、汝阳、颍川四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司州刺史，不久又兼任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前废帝景和元年，召进京城任命为游击将军、直阁。不久，兼任南济阳太守，进升爵位为侯，增加食邑二百户。又加封为冠军将军，改兼南东海太守，游击将军的官号不变。前废帝凶暴无道，而宗越和谭金、童太壹都为他出力卖命，诛戮许多官员以及擒捉何迈等人，无不尽心竭力，所以前废帝依靠着他的这些爪牙帮凶，得以肆无忌惮。赐给宗越等人美女、金钱、绢帛，充满了他们的家里。宗越等都是武人，粗豪强悍，缺乏远见，都是凭着重气用事，顾前不顾后，没有明确念头。前废帝准备到南方荆州湘州去，第二天一早就出发，那天夜里全部听任宗越等人离开官

中到外面住宿，宋明帝因此而能发动政变杀了前废帝。第二天早晨，宗越等人一起进宫，明帝对他们原加安抚，宗越改兼南济阴太守，原来的官职不变。宗越等人既已为前废帝卖尽力气，担心宋明帝不能够容下自己，明帝对待他们虽然很优厚，他们心里却都感到恐惧。明帝也不想让他们再在京城里做官，就很随便地跟他们说：“你们碰上了暴虐的皇帝，早晚辛苦劳累，苦乐应该对换一下，应该得到奉养自己的地方。兵马富足的大郡，可以随你们自己挑选。”宗越等人自己素来就有疑虑，一听到这一旨意，都互相看着脸上变了颜色，因此而计划造反做乱。他们把这一计划告诉沈攸之，沈攸之一一向明帝禀告，当天就拘捕了宗越等人下狱处死。当时宗越五十八岁。

宗越善于安排布置军营的位置，几万人行军宿营，宗越自己骑马在前，让军队跟在后边，边走边指挥，马停下来，军营也就安置完毕，从来没有过参差不齐。等到沈攸之代替殷孝祖为前鋒将领征讨义兴一带反对宋明帝的部队。当时殷孝祖刚刚战死，部下都很恐惧。沈攸之叹息说：“宗公可惜了的，他本来就有胜过别人的地方。”但是宗越统治军队十分严酷，喜欢用刑诛杀，一点小事情，动不动就军法从事。当时王玄谟对待部下也严厉少恩，将士们为此编出几句话：“宁可做上五年囚徒，不去跟随王玄谟。王玄谟还过得去，宗越却是要杀我。”

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文帝君臣竭尽全力，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和南北朝中都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

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羨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他需要职务，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也有过矛盾和裂痕，却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所以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官员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以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施政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统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并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

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及时采取了措施，予以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能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已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派人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下令简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又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他立即从其他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并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多次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等，使得

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不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于是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又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并立即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然且委派刺史贷给百姓。而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缺乏的人，可以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时给之。

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几千顷，当地民众因此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水入陂，但由于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由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治理淮水，开

垦湖垫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制订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未能进行，但足以证实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就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在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却反映出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宋文帝的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农阶层，使他们的情绪比较的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发展起来。史家称赞这一时期，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余粮栖亩，夜不闭户。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处处成群。

宋文帝时期，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玄学以何尚之、史学以何承天、文学以谢元、儒学以雷次宗分别教授。许多人都聚集他们门下学习，如后来的南齐创始人兰陵萧道成就曾在雷次宗门下攻读儒学。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开始设国子学，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下令表彰奖励。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鲁郡（今山东曲阜）重造孔子庙、孔子墓、重修学舍，并召集生徒。迁孔景等五户到孔墓旁，免去他们的租赋，专门看管孔墓。他们种植了六百多棵松树，表达了对这位圣先师的仰慕。

宋文帝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元嘉期间是曾三次北伐，试图统一中国，但均以失败多数。原因一是北方无机可趁，出兵时机不好；二是文帝用将非才，只用其亲信而不用真正的军事人材，如檀道济；三是文帝不善军旅武略，却每每遥制兵略，瞎指挥。

军事问题是“元嘉之治”的败政，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使北魏饮马长江，撤退时掳掠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宋朝也由此转衰。

南朝大学者裴松之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在山西）人，他的祖父裴昧，担任过光禄大夫。他的父亲裴珪，担任过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的时候，通学了《论语》和《毛诗》。他博览群书，为人清淡朴素。二十岁的时候，拜为殿中将军。殿中将军这个官是皇帝左右的近卫。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选拔名家参予顾问，才开始用琅邪的王茂之，会稽的谢辄，这二位一南一北享有很高的声望。裴松之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想让裴松之西上担任新野太守，因为事情困难而没有实现，于是拜他为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年，裴松之担任吴兴故鄣县令。有政绩，调入朝中任尚书祠部郎。

裴松之因为社会上个人所立的碑，文字与事实不符，于是上表说：“碑铭的写作，是为了昭示后人，从本意上说不是特殊的功勋和特出的德行，不应当享有碑铭。应当享有碑铭的人第一是思想勋绩影响很大，受到全社会的推崇的人；其次是高风亮节，有遗烈可记述的人；至于那些辅助皇帝的人，成绩显著的人，改造他所任职的地方的人，有好的教导长久流传的人，咏诗作文的人，也是需要勒铭镌刻的。不是以上几种人，如果也立碑刻铭就几乎是僭越和亵渎了。这种庸俗作假的风气兴起，使用华靡的辞藻由来已久，所以孔悝的铭文，正确的行为却遭到人们的非议；蔡邕写作碑文，因不符合事实，每有愧色。但自他们以后，流弊就更加多了。稍有职务，就必定要立碑刻铭，勒铭很少有能使人相信的事实，刊石只不过成了弄虚作假的家常便饭，真假混杂，

就使得应当得到美名的不显得珍贵，只说他们的功绩，又是些不足道的。对这种风气不加禁止裁办，它的弊病就会没完没了。”裴松之认为：“那些想立碑的人，应当命令他们都向上请示，经朝廷议论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去办。这样大概就可以防止不实之辞，表彰那些美好的事实，使百世以后，知道没有虚假，就会使仁义得到人们的信仰，办事的原则就会得到未来的崇敬。”于是以后立碑刻铭都依照裴松之所建议的办。

高祖刘裕北伐的时候，兼任司州刺史，让裴松之担任州主簿，后又转任治中从事史。攻克洛阳以后，裴松之担任州行事。宋建国之初，毛德祖出使洛阳。高祖下敕说：“裴松之是廊庙之才，不宜老是呆在边疆，现在召他回朝担任太子洗马，和殷景仁的待遇一样，可以让他知道。”当时议论建立王朝的音乐，裴松之认为妃子臧氏庙的音乐应该与其它四庙的音乐一样。升任裴松之为零陵内史，旋即征召他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426年），诛杀了司徒徐羨之等人，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淦、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杨州；尚书三公郎陵子真、起部甄法崇出使荊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出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出使南豫州和北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出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出使青州、兖州；裴松之出使汀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出使湘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出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出使广州；郎中殷斌出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出使交州；附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出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他们出使之时，在朝廷列班受诏诏书说：“从前帝王巡视天下，各诸侯述职，不然就是诸侯执行回朝朝觐、聘问的规定。由此看来观察民情而推行政治，任命官吏并考察他们的政绩，上上下下都一致，远远近近都一样，所以能够功业长久，治世的原则得以长期坚持。朕孤陋寡闻，继承了洪大的事业，只好小心谨慎，但不懂治理天下的原则，只有

整天忧愁，好像面临深渊一样。朕害怕国家的风气衰颓、百姓弄虚作假，重大的过失有违国家的和睦，水旱之灾伤害了百姓的产业。虽然朕亲自过问这一类的事情，想使其得到妥当的处置，但重要的事情实在太多，朕所见所做的有许多缺漏，政治和刑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没有全部清楚。这难道不是朕不够诚恳，使大家不能完全尽心尽意吗？不能救民于水火的惭愧，应由朕一人承担。因为天灾很多，还没有完全实行仁德的政治，帝王巡狩的制度被废弃了还没有恢复，虽然如此，朕眷顾百姓，没有忘记对他们的怜悯。现在派遣兼散骑常侍袁淦等到四方视察，到各郡县巡行，亲自与刺史、二千石长官们见面，申述朕治天下的诚挚之意，广泛征求治理国家的重要意见，观察官吏的政治，访求民众的痛苦，表彰有操行的官吏，慰问百姓的疾苦。无论官吏或民俗的得失，都依据周朝的典制加以裁断，每件事情各写成书奏，回来之后都分门别类上奏，帮助朕弄清情况，好像亲见一样。各位大夫君子，请你们全心全意以此事为重，不要怠惰。下面的人如果有良谋大计，请诚心诚意细致地讲出来，上呈使者，不要有任何保留。这样才能使朕恭敬地采纳好的意见，以补政治上的缺漏。各位努力吧，一定要满足朕的心愿。”

裴松之回来之后上奏说：“臣下听说天道是给世界光明的，君王的德行是以全面治理社会为极至的。古代圣哲的君主，因为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所以一个人有好的想法，社会就富足和平；虽然只在江、汉推行礼制，其良好影响却很远。所以能够让后人咏颂他们宏大的功业，创造出比周朝好的典则。陛下神思玄通，思想举世无双，身居天子之位，考虑着四面八方，咨询施布教化的不足，思虑荐举贤才之路还不通畅，公正地询问下民的痛苦，同情他们当中的鳏夫、寡妇，光辉伟大的感召，影响远及四方。这些举动以很早以前的《雅》、《诰》为法则，英明的训示传扬到了边远的地方。所以全国民众恭敬地颂扬，很远的外国也感

到喜悦，莫不歌唱吟诵欢欣鼓舞，铭记皇恩；有的扶老携幼，在路旁述说欢喜，实在是因为养育之恩流布，因此忘其所以。千载以来，只有这时候才出现这种情况。臣下谬蒙选任出使，不合格地与显要的人物同列，才能缺短，思想简单，无力宣扬圣旨，严肃倡明风化，进退人才没有章法，访求推举也孤陋寡闻，惭愧惶恐，不知所措。现在上奏二十四条，谨恭地随事写成。臣下见癸卯诏书，说官吏民风的得失，都依据周朝的典制加以裁断，每件事情各写成书奏，回来以后分门别类上奏。现遵诏依事为类附之于后。”裴松之很懂得出使的意义，谈论的人都赞扬他。

后来，裴松之累任中书侍郎、司州、冀州两州的大中正。文帝选派他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于是裴松之累集资料，增加了不同的说法，写成后奏上，文帝认为注得很好，说：“这个注是不朽的！”就调他出任永嘉太守。他为太守，勤政恤民，官吏和百姓都感到自如。所以又让他入补通直散骑常侍，后又兼任司、元冀二州的大中正。不久他又出任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他告第退休，被拜为中散大夫，不久又兼任国子博士。后又提升为太中大夫，仍然任博士。裴松之打算续写何承天所写的刘宋国史，没有来得及动笔。元嘉二十八年，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八十岁。他的儿子名驎，任南中郎参军。裴松之所写的论文和《晋纪》，裴驎注释的司马迁的《史记》，一并在世上流行。

《后汉书》的作者范曄

范曄，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内乡西）人，是车骑将军范泰的小儿子。他的母亲上厕所时生下他，他的额头被砖弄伤了，所以他以“砖”作为小字。他过继给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从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能写隶书，通晓音乐。他十七岁时，州里辟召他为主簿，他没有去。曾任高祖刘裕的相国掾彭城王义康的冠军参军，随府又转任右军参军。入朝补任尚书外兵郎，出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又召回朝任秘书丞，因父亲去世而卸职。服丧期满，他担任了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任新蔡太守。檀道济北征，范晔害怕随行，借口脚有疾病，皇上不允许，让他由水路统率船队装载武器北上。军队回来以后，范晔担任司徒从事中郎，旋即升任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天，彭城太妃逝世了。将要安葬的时候，设奠祭那天晚上，官员故旧都集中在东府。范晔的弟弟广渊，当时为司徒祭酒，那一天正好值日。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在广渊的府中住宿，夜里二人畅饮，打开北面的窗户听挽歌取乐。义康大怒，贬范晔为宣城太守。范晔不得志，于是删削数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范晔在宣城待了好几年，才升任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又加官为宁朔将军。范晔之兄范嵩担任宜都太守，其生母跟随范嵩在所任上。元嘉六年，他们的母亲去世了，但遣人报告范晔却只说母亲有病，范晔没有及时奔赴。等到范晔启程去看望他母亲时，又携带了妓妾跟从，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刘损上奏了，太祖爱范晔的才华，没有降罪。为母服丧期满后，范晔担任了始兴王刘濬的后军长史，兼任南下邳太守。刘濬理扬州，没有亲自过问政事，都委托给范晔。不久范晔又升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高不超过七尺，又胖又黑，没有眉毛和胡须。他善于琵琶，能够作曲。宋文帝想听范晔的弹奏，多次委婉地表达这一要求，范晔却假装听不懂，最终也不肯为宋文帝弹奏。宋文帝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很快活，便对范晔说：“我想唱歌，你来伴奏。”范晔才依旨而为宋文帝弹奏。宋文帝唱完了，范晔也停止了弹奏。

当初，鲁国的孔熙先博学有纵横的才志，文史星算的学问，没有不精通的。他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不被当时的人所了解，很